

当代
经济学
系列
丛书
Contemporary Economics Series

陈昕
主编

当代经济学文库

低效率经济学

集权体制理论的重新思考

胡汝银 著



格致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Contemporary Economics Series

陈昕 主编

当代经济学文库

低效率经济学

集权体制理论的重新思考

胡汝银 著



格致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低效率经济学:集权体制理论的重新思考/胡汝银
著.—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陈昕主编,当代经济学文库)
ISBN 978-7-5432-2378-3

I. ①低… II. ①胡… III. 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研究 ②社会主义经济-经济体制-研究 IV. ①F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75319 号

责任编辑 邱盈华
装帧设计 王晓阳

低效率经济学——集权体制理论的重新思考

胡汝银 著

出 版 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编辑部热线 021-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63914081 www.hibooks.cn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3 插 页 3 字 数 162,000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2-2378-3/F·739	定价:42.00 元

主 编 的 话

上世纪 80 年代，为了全面地、系统地反映当代经济学的全貌及其进程，总结与挖掘当代经济学已有的和潜在的成果，展示当代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我们决定出版“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是大型的、高层次的、综合性的经济学术理论丛书。它包括三个子系列：（1）当代经济学文库；（2）当代经济学译库；（3）当代经济学教学参考书系。本丛书在学科领域方面，不仅着眼于各传统经济学科的新成果，更注重经济学前沿学科、边缘学科和综合学科的新成就；在选题的采择上，广泛联系海内外学者，努力开掘学术功力深厚、思想新颖独到、作品水平拔尖的著作。“文库”力求达到中国经济学界当前的最高水平；“译库”翻译当代经济学的名人名著；“教学参考书系”主要出版国内外著名高等院校最新的经济学通用教材。

20 多年过去了，本丛书先后出版了 200 多种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标准化。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分析技术等方面完成了中国经济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轨；二是培养了整整一代青年

经济学人，如今他们大都成长为中国第一线的经济学家，活跃在国内外的学术舞台上。

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我们将继续引进翻译出版国际上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加强中国经济学家与世界各国经济学家之间的交流；同时，我们更鼓励中国经济学家创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在自主的理论框架内消化和吸收世界上最优秀的理论成果，并把它放到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实践中进行筛选和检验，进而寻找属于中国的又面向未来世界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理论，使中国经济学真正立足于世界经济之林。

我们渴望经济学家支持我们的追求；我们和经济学家一起瞻望中国经济学的未来。

顾昕

2014年1月1日

如何成为好的经济学家

(代再版前言)

这本书 1992 年 4 月初版。这是一部标准的现代经济学专著。客观地说,它也算得上是迄今为止国内外研究传统计划经济最为优秀和经典的经济学著作之一,大大地拓展了现代经济分析的广度、深度和效力。并且,它的很多分析方法、基本的逻辑推理,明言的和隐含的基本原则、理论观点与政策建议,也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包括适用于当下的中国经济社会和企业组织等。

奥地利裔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对计划经济的分析明显地带有强烈的哲学思辨和意识形态的色彩,没有一个成体系的严密理论框架,匈牙利知名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的名著《短缺经济学》对传统计划经济的分析则带有强烈的社会学色彩。相比之下,本书主要基于中国经验对传统计划经济展开的系统、严谨而又全面的理论考察,则是地地道道的现代经济学分析。

它是我基于自己广泛、丰富而又刻骨铭心的生活体验与工作经历、长期穷根究底的经济理论思考和大

量的研究与材料积累,全力以赴、绞尽脑汁地连续伏案两个多月时间,以每周一章的速度闭门写成的。书中的理论分析大量源自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和深度专业提炼。

写作期间,很是投入,很是辛苦,每天深夜才上床睡觉。一直在不停地想,不停地思考、推敲、修改,字斟句酌,搜肠刮肚,也不停地写,在文稿纸上奋笔疾书。有时候睡下来对某个问题的苦思突然柳暗花明,达到顿悟,寻觅到了满意的结果,便欣喜若狂,不能自己,立即翻身下床,开灯提笔疾书,以免第二天醒来时无法完全重现晚间的关键思考细节而影响写作效率。书稿完成后,本来就很清瘦的我竟然又减少了几斤体重,身体也虚弱了一些,颇有些“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体认。幸有妻子对我的事业全力支持,工作之余承担了所有家务。

一、本书理论研究的缘起和生活基础

经济理论研究以现实生活为依归。现实生活为经济理论研究提供了直接的对象,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养分、例证、思路、灵感和真知灼见。

我在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那是一个生活极为艰难困顿、极为贫穷落后的年代。

1955年我出生于长江中游湖北省武穴市余川镇(原为广济县余川区)的一个山村,山村初祖为清初以廉洁著称、以正二品布政使“告病”回乡、90而终的“破轿老爷”胡一珪。在历史上,家乡是一个土地肥沃、满山参天古树的地方。天清气朗时站在村子的后山顶上能看到远处南面的庐山和东北面的大别山余脉的险峰。但从我记事时起,似乎村民们的生活就很艰难。1958年前后大炼钢铁,村民们响应政府号召把后山上的古树都砍光了,送去烧火炼铁,同时拿着脸盆等器皿到河里去淘铁砂,将自己家里的铜盘等金属用品收集起来,投入土高炉中“炼钢”。那时候也在修筑几十里地之外的一座水库,父亲就是在修水库时长期泡在冰冷的泉水中积劳成疾而丧失劳动能力的。我和哥哥年幼,家里只能靠坚强的、三寸小脚的母亲所挣的微薄劳动收入糊口。因营养有限,我一直长得很清瘦。1959年前后,村里也刮起了“共产

风”，办起了大食堂，全村人在食堂里一起吃大锅饭，没有定量和限制。先是放开肚子吃白米饭，后来吃掺有青菜的饭，不久粮食迅速短缺，食堂关闭。加上严重干旱，人们生活不下去了，开始外出逃荒。那时，人们饥饿难耐时甚至吃观音土，吃后大便不出来，只能用手抠。我的祖父就是在放牛时被水牛重踩了一脚受伤的，加上饥饿，最终不治身亡。

“文革”早期家乡搞“破四旧，立四新”，大家积极响应，闻风而动，各种各样的旧书、家谱等被烧掉，精美的绣花枕头上的花、蚊帐的绣花帐沿等被剪掉，油漆描花的床、梳妆台等被打断烧掉，山上的很多墓碑被掀倒搬走用作大队猪圈的建筑材料，一些带有天井的、富有特色的老房子被拆除重建，各种各样的首饰、银元、铜钱、铜圆被上交，抄“地富”反“坏右”的家，把各种东西翻得底朝天，用绳子牵着头上戴着纸糊的白色圆锥形高帽子的地主去游走示众，搞批斗会。一些地主富农其实是相当本分的人，有的有一些文化，人很聪明，有的是老实巴交、踏实劳作、不会取巧的善良农民。而少数解放前家里很穷的贫雇农则可能是游手好闲之辈。村里常常组织大家开会搞忆苦思甜，忆解放前旧社会的苦难，思新社会的幸福，唱“想起了往日苦，两眼泪汪汪”等歌曲。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一位乡亲忆苦时忆着忆着就声讨起了1958年修水库时村（那时叫“大队”）干部是如何不给他们饭吃和打骂他们的。后来出现了造反派之间的派系争斗，大家拿着“八万八”（即88000字的《毛主席语录》），从书中各取所需地念起一段话，攻击对方，保护自己。不久，他们之间发生了武斗。很多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退伍老兵们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拿着抢来的真枪实弹射击对方，时常死人。有些人至死仍然认为自己是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我的堂姐夫是一名令我景仰的抗美援朝老兵，也加入了武斗队伍，有一次甚至把一枚黄铜弹体的手榴弹藏在我们睡的长枕头底下。

1968年前后，家乡大搞兴修水利和道路，垦山植树，劈山造田，改变河道，用山上长草的沙质表土改良稻田黏性土壤，搞“农业学大寨”，搞劳动者集体讨论“评工分”，每月按照所评定的日工分标准和出勤时间计算个人的劳动报酬。一些人在评工分的会上为评高自己的工分往往争得

面红耳赤，但在干活儿时磨洋工，出勤不出力，不注意劳动质量。自己家的菜园自留地种得很好，生产队的地种得很差。有时队里分的口粮不够，只能用野菜充饥。

彼时在政治上，村民们搞“早请示，晚汇报”，即每天早晚两次聚集在用砖砌成的两人高的、喷有红色毛主席侧面头像的白色“忠字牌”前，右手高举“红宝书”（《毛主席语录》），齐声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背诵毛主席的话，佩戴毛主席像章和红袖标，跳“忠字舞”，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搞“狠斗私字一闪念”和“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要念念不忘包括英美在内的“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小时候我一直喜欢读书，几乎嗜书如命，喜欢四处借书找书、清净地看书，坚持打扫家里和门前屋后的卫生，放牛、干家务，每天上学之前负责将家里牛栏中的牛粪挑到山上集中摊晒，没有时间、也不愿意和小伙伴一起在学校来回的路上打打闹闹。因父亲很早就生病丧失了劳动能力，哥哥读完小学四年级后就被迫辍学务农，这使我特别珍惜极为宝贵的读书机会。我读完小学一年级，因家里困难，也辍学回家放了半年牛挣一点点工分。后来重新上学，插班读二年级下学期，读书勤奋，积极举手回答甚至抢答老师的课堂提问。在读高小的时候，成绩很好，很受老师的欣赏，经常和老师一起批改作业，在公社和区的万人大会上作为优秀学生代表发过言。开展的“小民兵”活动成为全区小学的优秀典型。在母亲的鼓励下十多岁的时候就开始在生产队里劳动干活挣工分，尤其是学校放假时。在暑假的“双抢”（抢收早稻，抢种晚稻）农忙季节，劳力紧张，起五更、睡半夜地下田割稻、扯秧。黑夜在水田里扯秧，有时候蚂蝗很多，爬到腿上，吸血吃饱后一条蚂蝗成了一个鼓鼓、溜滑的圆球，拉下来后伤口流血不止。读初中的时候，因学校撤并，校址变动，先后换了四所学校，毕业考试成绩名列年级第一。1971年，我开始念高中。渴求知识，读书很刻苦。担任班级学习委员，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不少同学很有才华，班级的黑板报质量很高。教语文、数学的老师很有知识和教学魅力。外语只有俄语老师。学校搞“学工、学农、学军”，我们种地、

集肥、养猪，制作水泥，学工，搞军训，在指定的地点颤巍巍地挑大量的石头到工地，集体帮助学校挣钱弥补经费缺口。

高中毕业后，依依不舍地离开知识殿堂，回到村里务农，参加大队青年施工突击队，后来又担任大队团支部书记、民兵连副连长、水利工程总指挥。在作为大队干部蹲点住队时，与村民打成一片，什么农活儿都干，挑稻等再重的农活儿也不回避、不叫苦、不怕累，很受好评。

1973年年底入伍到川东涪陵。新兵训练结束后分配到警通连，后来改名为特务连，当过战士、文书、班长，表现很好，做事很卖力，军事素质和业务素质很过硬。笔杆子不错，在部队和地方的报纸上发表过多篇文章。在政治文化学习时，我有时还给干部战士们作专题辅导报告。参加过“批林批孔”（批判林彪和孔子）、“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政治运动。部队的生活、训练和工作同样非常艰苦，体力消耗大，有时简直是在玩命。有一次我带着几个战士装炸药排除石头，因估计不准装多了炸药，大小石头碎片飞到营房的屋顶和在营房旁空地上蹲着吃饭的干部战士身边，把指导员的脸都吓白了。因为意外、疾病、遇险等，一些熟悉和不熟悉的战友死去。我们的部队经常死人，也经常拼着命地参加地方抢险救灾。此外，令我震惊的是，与老家相比，部队驻地附近农民的生活太苦了，他们有的冬天还光着脚，衣衫单薄破旧，食不果腹，劳动一天工分的货币报酬只有5分钱。深山里的一些人家家里仅有一套衣服可以完整地蔽体，谁到集市上去谁穿上。在那里，我平生第一次知道，这世界上竟有买卖妇女的人贩子，那儿的人太穷了，很愿意自己被卖到外地去或让别人带到外地。1976年前后，我出差到重庆去，在解放碑附近的餐馆里吃一碗麻辣小面，面一端上来，周围就围上了可怜兮兮的乞丐们，心一软，面条没怎么吃就送给他们了，顺手还送了几两粮票给其中的一个，得到粮票的乞丐感激拜谢，口中喃喃地说：“解放军万岁！”对我的心灵震撼很大。

1978年2月，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我幸运地穿着军装进入复旦大学攻读经济学专业。在大学假期每次返家的长江轮船上，总有一些江苏和安徽的壮年乞丐登船要饭。看着他们，自己的心里总是悲悯不已，难过十分，思绪不宁。从本科生到博士研究生，大学10年，学习

如饥似渴，废寝忘食，研读古今中外精品名著，广开视野，从经济学、管理学，到哲学、历史、宗教、政治、文学、艺术、社会学、自然科学，几乎无所不读。有些书、特别是教科书，反复精读，不断提炼，不断诘问，穷根究底，做了很多旁注、读书卡片和读书笔记，几乎烂熟于心。那时候，自己思想开放，精神自由，纵横驰骋，没有教条，没有禁锢，没有束缚，勇于挑战权威，探寻真谛。读三大卷的《资本论》，包括每一个脚注、每个数字在内，我都分析再三，甚至发现了其中多处数字计算错误，并加以纠正，提供给主讲教授，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研究生期间，我用新的视角和分析逻辑写成的一篇重新解读、阐释、建构《资本论》的文章，发表在厦门大学的《中国经济问题》杂志上，得到当时著名党刊《红旗》主编苏星先生的好评，在《红旗》上破天荒地全文转载。苏星和于光远很早合编过政治经济学教材，是《资本论》研究行家。大学期间，我的一大嗜好，是将大部分工资用于买书读书。

我是部队在地方大学读书的首个文科博士，聚焦于中国产业组织等问题的博士论文《竞争与垄断：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分析》在当时全国经济学界 20 多位同行评议专家中得到普遍好评，并于 1988 年获得孙治方经济科学著作奖。为了追求更为自由、更为喜好的职业环境，1988 年初博士研究生毕业前夕我通过各种关系和途径想办法办理了部队干部转业手续，同时避开了仕途，进入大学专门从事自己倾心的经济理论研究。其间和研究所的同事们一起对上海国有企业中与广泛存在的“3 个人的活儿 5 个人干”相联系的严重隐性失业问题进行了系列调研，并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上海的报纸大量报道，上海市政府领导和很多参与讨论的企业、政府部门很重视，跃跃欲试，后因宏观环境不行而放弃。我承担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社科基金的项目，研究产业组织和企业运营机制，花很多时间泡在企业，和上海的企业家们广交朋友，广泛讨论，广泛调研。在企业调研中，当时管理经验极为丰富的上海英雄金笔厂老厂长赵松生所说的“我们的个人素质不比新加坡等外国的同行们差，甚至强过他们，但我们的管理体制使得我们难以成为业界的国际领先者”言犹在耳。1989 年年初，我承担了当时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在国内最

先提出的“如何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课题，深入了解实情，发现问题所在，厘清思路，确定解决方案，着手行动，上下沟通协调。市委研究室主任和经济处的干部也一直参与企业调研。形成的主报告被他人全文译成日文在日本的《立命馆经营学》上登载。在大学工作期间，和同事们一起创立了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1994年，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我离开了大学，离开家人，“下海”到深圳的几家上市公司工作，到第一线体验企业和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实际。1997年返沪受邀进入上海证券交易所专门负责研究工作，将很多精力花在改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和推动证券市场制度变革与产品创新上，尤其是市场化改革和法治秩序建设。部分研究心得浓缩在“中国公司治理系列报告”、《有为与无为之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与变迁》、《中国公司治理：当代视角》等书中和大量的内外研究报告中。在我的写作计划与写作材料积累方面，自己还想基于本书的若干核心观点和分析逻辑，继续推进和拓展长期以来的理论探索，写一本《现代国家治理的经济分析》。为此已准备了多年。

二、经济学家的做人与治学之道

进行经济学研究，无疑是我毕生最喜爱、最欣赏、最自豪、最投入、最乐此不疲的事业。

古人强调，言为心声，文如其人。

写书其实是在做人，或者说写书首先是在做人。一个人的所写所书，真切而又全面地反映和展示了一个人的人格特征、专业涵养、人生诉求和价值取向。因此，书的品位和品质，依赖于人的品位和品质。要写好书，首先需要做好人。

什么是好人？

复旦大学周谷城教授曾经指出，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很大程度上是在教人如何去做一个好奴才。

近代中国思想大师梁启超在《论私德》一文中痛切地揭示了中国几千年来专制社会中普遍的人格扭曲和逆向选择现象：

“吾民族数千年生息于专制空气之下，苟欲进取，必以诈伪；苟欲自全，必以卑屈。其最富于此两种性质之人，即其在社会上占最优胜之位置者也；而其稍缺乏者，则以劣败而渐灭，不复能传其种于来裔者也。是故先天之遗传，盘踞于社会中，而为其公共性，种子相熏，日盛一日，虽有豪杰，几难自拔，盖此之由。不宁惟是，彼踟躇于专制之下，而全躯希宠以自满足者，不必道，即有一二达识热诚之士，苟欲攘臂为生民请命，则时或不得不用诡秘之道，时或不得不为偏激之行。夫其人而果至诚也，犹可以不因此而磷缁也，然习用之，则德性之漓，固已多矣。若根性稍薄弱者，几何不随流而沈汨也。夫所谓达识热诚欲为生民请命者，岂非一国中不可多得之彦哉！使其在自由国，则大政治家，大教育家，大慈善家，以纯全之德性，温和之手段，以利其群者也。而今乃迫之使不得不出于此途，而因是堕落者十八九焉。嘻，是殆不足尽以为斯人咎也！”

已故哲学家张东荪将中国近代以来的问题归因于士阶级的“只知苟且；只知规避责任；只知迎合意旨；只知从中取利；只知说假话；只在夹缝中讨生活”。

中国儒家强调君子要有“智”、“仁”、“勇”三大品行，要“好学”、“力行”、“知耻”，要“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什么是好的经济学家？

好的经济学家决非卑屈、诈伪、懒庸、浮躁、心性不正、苟且偷生、泯灭良知、投机取巧之徒，而应当是一个淳朴率真、精神世界空灵澄澈、不脱离生活、有炽热的人文情怀、出色的专业认知能力和道德品性、敢于并善于在经济理论研究中“立德、立功、立言”者。

德国伟大诗人歌德的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与中国儒家的“格物致知”说殊途同归。没有生活土壤的理论是没有生气、活力和生命力的。经济学就在人们的身边甚至身上。现实生活是经济理论的根和土壤。经济学家要有系统、全面、缜密严谨的专业理论修炼，不能浅尝辄止，要到现实生活中充分观察、体验和汲取滋养，触抵社会生活和行为主体的灵魂最深处，不能脱离生活，不能无视现实，不能睁眼说瞎话，不能对现实生活和人们的实际行为愚昧无知。

经济理论的大楼盖得再高,地基是最根本的。这种地基即是与生活现实相吻合的基本理论假说和可证实、可严格推演的基本原理。没有坚实稳固的理论地基,经济理论大楼就会变成今天人们笑谈的“楼歪歪”、“楼脆脆”,变成歪理谬说或无法操作的空想。若将这种理论付诸实践,或者造成社会灾难,或者导致南橘北枳、南辕北辙。

改革开放以来,在极为浮躁和贪婪的各种欲望的驱动下,我们当年在大学生活中所见到的那种教师热衷于教、学生热衷于学、研究者热衷于研究的奋发飞扬、一派热火朝天的理想气息,在今天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似乎渐渐远去了。

愚昧源于无知,包括理论上的无知和对现实的无知或视而不见。

德国医学家、哲学家巴拉塞尔士强调:“一无所知的人什么都不爱。一无所能的人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懂的人是毫无价值的。但是懂得很多的人,却能爱,有见识,有眼光……对一件事了解得越深,爱的程度也越深。”

中国进一步的经济改革,需要改变经济研究方面的某些浮躁和无知状态,需要经济理论研究先行。改革是问题导向的,首先需要经济学研究的问题导向,需要经济学家在经济研究和经济改革中倾注自己的专业、理性之爱,从生活中找到经济学研究的热情,把自己的一切,包括身体、思想、灵魂,都义无反顾地倾注于经济理论研究之中,遵从重要的价值观,坚守最高的专业标准,富有定力和思想能力,倚仗事实,找准问题,发现真理,传播真知,不断创新,言其所应言,行其所当行,不畏艰难跋涉,实现经济学研究资源的最优配置,最大限度地推动经济理论发展和社会进步。这是正直的经济学家的良心和历史责任。经济学家们应耻于成为人们取笑谈资的“砖家”,应当有理想、抱负、勇气、决心、卓越的专业能力和献身精神。

瑞典心理学家安德斯·爱立信(Anders Ericsson)在其开展的“如何成为精通某一领域的世界级专家”研究项目中,提出了一个“1万小时规则”,即一个人需要1万个小时以上的练习才能精通某一领域,取得超人成就,成为成功人士。除了天赋之外,卓越的绩效需要长期的、有计划的实践,以及远离舒适的高度专注和无情练习,需要真正的激情和内驱力。

经济理论研究领域无疑也不例外，没有捷径可走。

为了不断推动中国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实践走向成熟，为了不断增进人民的福祉，为了不断推动社会进步，让我们在当今浮躁的社会环境下心无旁骛，深入生活，缜密思考，不甘平庸，不坠青云之志，将严谨而又出色的经济学研究进行到底！

三、中国改革前后新老基本经济问题及其共同原因

在比较经济学中，传统的计划经济又被称作“统制经济”(controlled economy)或命令经济(command economy)。

为什么领先采用这种集权体制的苏联会分崩离析，陷入彻底的失败？为什么我们要进行改革，抛弃这种经济体制？

说到底是因为这种体制的效率太低，缺乏制度竞争优势。

今天，中国经济发展中遇到了一系列困难，出现了一系列难题，从根本上说，也是因为社会经济运行和发展的效率不够高，出现了政府官僚主导、GDP“挂帅”和对经济增长速度的狂热迷恋。

正如本书所强调的：“重视速度而轻视效率，这即是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政策误导和理论误导。”

政策误导自不待言，理论误导亦明显可见。同时，政策误导和理论误导由于国内外众多学者和政府官员错误地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需求管理简单照搬到社会经济政策实践中，而变得益发严重，危害巨大。

按照本书的倡导和分析逻辑，要避免以上误区，必须转换理论研究的范式和社会经济政策实践的重点，以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注重供给而不是总需求管理，聚焦于效率，推进广泛的制度变革，从根本上解决广泛存在的低效率问题。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成为具有长期动态国际竞争优势和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强国。

改革是问题导向的。要改革首先要抓准问题，抓住要害，明确改革的方向和方法。

我们所要改革的传统计划经济有哪些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其机理和原因何在？

人们始终会受到割不断的昨天的影响,或多或少地复制昨天。由于路径依赖和历史遗产的延续,传统计划经济中的大量问题又改头换面、甚至完完全全地出现在处于转轨过程的当下中国社会经济体系中。

这些问题会引起何种社会经济结果?通过哪些特定的制度结构和经济组织机制的改革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推动中国经济进入高效率、高质量增长的历史轨道?

不厘清问题,明了有效的解决之道,改革就会是盲目的,就会变成“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并可能痛失不会再现的改革良机。

本书广泛地运用现代信息经济学、博弈理论、量化分析、监督与激励机制理论、最大化行为、非经济强制、行政压力、政治安全等各种有效的或具有中国经济特色的经济分析工具,从资源配置机制、激励机制、经济增长机制和社会经济运作的不同层面,深刻地剖析并从理论上完整地再现了计划经济条件下为何集中计划、集中控制和集中决策是低效率的,企业与劳动组织是低效率的,制度与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是低效率的,按劳分配等经典理想是难以操作的。本书基于严格的经验材料和定量研究展开分析并推导结论,深度解剖各种悖谬现象背后的原因,清晰地解释整个计划经济运作机制的困境和缺陷、发生和演进趋势,层层递进,环环相扣,使得对集权体制的理论分析变得极为系统、严谨、精致。全书研究从大处着眼,小处落笔,它不是从高调虚妄或意识形态性质的假想出发,而是从实际可行的角度去展开理论研究。大量的分析今天依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普遍适用性。

各种各样程度不同的低效率是不同组织和社会经济体系的痼疾。该如何认识和医治它们,是这些组织和经济体系的一个核心课题。本书为此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易扩展的经济分析基础。

本书的现代经济学味道,是深沉的、厚重的、纯正的,值得并经得起人们长久、反复的咀嚼与品味。

胡汝银

2014年2月20日

前 言

本书是为一切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怀有真诚兴趣和真诚动机的人而写的,也是为一切希望洞悉集权经济理论底蕴的人而写的。

自 1979 年以来,中国一直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要对传统的社会主义集权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是因为这种体制是一种低效率的体制。这种低效率的体制,产生了大量的低效率的结果。主要以中国经济为背景,对集权体制下普遍存在的低效率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即是本书的主题。

要通过成功的经济体制改革来消除存在于集权体制中的严重低效率问题,首先便需要透彻地了解低效率的成因及其对整个社会经济运行过程的影响,并借助由此而获得的知识,来对可供选择的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和政策方案的有用性作出评价,从而提高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信息效率和学习效率,自觉地避免选择必定无效的行动方案,缩短尝试错误(trial and error)的过程,缩短搜寻成功的体制改革方案的过程,以便降低体制改革的成本,降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学费”。

经济学是一门探求经济事实和真理的科学,是一